

先秦至西汉《礼记·缙衣》学术源流考

延瑞芳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传世本《缙衣》作为戴圣辑《礼记》中的一篇, 其成篇年代、作者及其后的传授情况历来不详。上世纪90年代湖北出土了一批郭店楚简, 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回购了一批楚简, 这两批文献中都有《缙衣》篇, 证明其成篇年代不晚于战国。传世本、郭店简本、上博简本三者互证, 使我们可以对《礼记·缙衣》作一番追本溯源的研究。

关键词: 《缙衣》; 《礼记》; 郭店楚简; 上博简; 学术源流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一直以来, 因年代久远和客观条件限制, 历史上对《礼记·缙衣》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上世纪后期我国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书, 其中有两篇是《缙衣》, 一篇来自于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的竹简(下文称“郭店简本”)^[1], 另一篇被收入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下文称“上博简本”)^[2]。这两篇文章沉睡地下二千余年, 一直未经干扰, 较好地保存了《缙衣》先秦写本的原貌, 也使部分学者认为《礼记》著书年代为西汉时期的说法不攻自破。传世本、郭店简本、上博简本三者互证, 使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考见《缙衣》成篇年代及作者、传抄状况和诸本异同等情况, 从而对其作一番追本溯源的研究。

一、《缙衣》作者及成篇年代

1、《缙衣》的作者

关于《缙衣》的作者, 历史上一般有两种说法: 一为《隋书·音乐志》所记南梁沈约的“子思子所作”说; 一是见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的南齐刘瓛所言“公孙尼子所作”。郭店简本《缙衣》出来以后, 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子思子所作。愚以为《缙衣》的著作权应该属于孔子, 子思子只是记述。

《史记·儒林列传》云: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 幽、厉微而礼、乐崩, 诸侯恣行, 政由疆国, 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 于是论次《诗》、《书》; 修起礼、乐。”《诗》、《书》称论次, 礼、乐称修起, 措词有别, 其义则同, 都是对《史》、《书》、礼典等的编修。这也可从《论语》中孔子大量对“礼”的相关言辞得以证明。

再者, 从《缙衣》的文体来看, 其与《论语》一样具有鲜明的语录体特征, 只不过内容是汇编而成, 无论是简本和传世本都略显杂乱。且因论及政治, 情感因素较《论语》有所欠缺。但通观全篇, 语句通俗而生动, 言近口语而少修饰, 贴近日常生活, 与子思所作的《中庸》从语气、修辞上都有不同。

李零先生在《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中转引李二民的看法指出: “《缙衣》有两条‘子曰’是与《论语》重出, 很明显是记孔子之言; 两条见于贾谊引用, 也是作‘孔子曰’ (李二民《缙衣研究》)。”^[3]

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云“周秦之书, 不必手著。《汉志》所载之姓名, 不尽属著述之人。其他史志及目录所载书名撰人, 皆不免有讹误。”^[4]由此可知, 古时撰者和写者(此处书者指形之于竹帛, 写成书本者)往往并不是一人, 这已被《老子》、《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多经典所证明。《缙衣》作为《礼记》中的一篇, 也不例外。

以上可以表明, 《缙衣》的原创者或者说其思想来源应为孔子而不是子思子或公孙尼子。

只不过孔子可能“述而不作”，没有手录，而是由七十子后学者记录下来。七十子后学者在记录的过程中对语句加以解释或删减在先秦古书中并不少见，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其是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2、《缙衣》的成篇年代及书写者

鲁哀公之后，礼书中最重要的部分《礼经》逐渐形成；《礼记》作为解释经书的文字，成篇又应在此之后。引其师曹元弼《礼经学·会通》云：“二戴记之说礼，大类有三，曰礼、曰学、曰政……《王制》、《月令》、《夏小正》、《文王官人》之等，政类也。”并言：“按三大类来区分大戴辑《礼记》三十九篇、小戴辑《礼记》四十九篇，就能使各篇何者当属礼类，何者当属政、学类，性质明确，界线清楚。”^[5]曹沈两位先生此处并没有提到《缙衣》当属何类，但从《缙衣》内容来看，其明显属于《政》类，或者说是政论式语录体。

沈先生又根据文献，在此文中考证出：“二戴所辑《礼记》现存八十五篇，除了可以确定为秦汉人所作以外，政类、学类并《乐记》等三十多篇撰作较早，约在鲁穆公时。”^[6]沿用沈氏的说法，可以推断，《缙衣》初写本的上限为鲁哀公时期，据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可知，鲁哀公在位年代为公元前494年至公元前468年，故《缙衣》的写作上限为周景王、敬王、元王之时；鲁穆公在位年代为公元前415至公元前383，故《缙衣》的写作下限为周考王、威烈王时期，如果再确切一点，则《缙衣》成篇年代为公元前494至公元前383年左右，同样，《缙衣》最初的文本即手稿本也出现在此时。《缙衣》手稿本的出现，使其抄写和流传有了可能。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载，子思应生活在鲁穆公时期；郭店楚简中又有《鲁穆公问子思》篇，故《缙衣》的记述、书写者应该就是子思，文字应为战国时期鲁国文字。

二、从郭店简、上博简看《缙衣》在楚地的传抄

关于郭店简本和上博简本的篇章结构，字体为楚文字等，前贤对此多有研究，兹不赘述。至于郭店简本《缙衣》抄写的时代，王葆玟先生《郭店楚简的时代及其与子思学派的关系》认为郭店墓之上限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后，对其下限多数学者则认为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这一点应该是可信的。而上博简因为是从香港文物市场上回购，没有明确的时代信息，可以确定的是战国之前的版本。在此我想推测一下谁最先和有可能把《缙衣》篇带到楚国，郭店简本和上博简本《缙衣》的传者也最有可能是谁。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有言：“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蛮黠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7]对陈良一人，沈文倬先生在《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一文中有详细考证，可为公论。由沈先生的考证可知，陈良在孟子游齐时已死，而孟轲游齐当在齐威王时。

《中国历史纪年表》记载，齐威王在位年代为公元前352年至320年。那么陈良教授陈相兄弟最晚应该在320年之前。《史记》中有“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据孟子所言，陈良作为南蛮之人，北方之学者，都没有比得上他的，说明学问确实很优秀，有作楚国东宫之师的资格。战国时不像西汉那样拘泥家法，且熟悉礼典为儒生之必备。有学者如姜广辉老师等认为郭店楚简墓主人为陈良，即楚怀王当太子时的老师^[8]；查怀王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陈良最晚死于公元前320年，这样讲有一定道理。故可把《缙衣》写成楚文字本并传授者定为陈良，郭店简本《缙衣》抄写者可能是抄手，更可能是陈良本人。

三、西汉《缙衣》的隶定、传授以及戴圣辑《礼记》

1、汉初《缙衣》的版本

从战国郭店简本和上博简本《缙衣》文字内容的完整性来看，它不是某种摘抄本。其内容

与今本《礼记》基本相合，文字也大体能够对应，其间有不容置疑的因承关系。但很明显，因为章节顺序完全不同，传世本也绝非简本的直接隶定本。那么我们需要得知今本《礼记》是据西汉之前哪一个版本隶定的呢？因唐以前书籍的流传基本都靠手抄，故要看人们研习此经典的传授情况，在汉代更是如此。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政策。为了其政治目的，秦始皇和李斯对六国史记、诗、书、百家语等不遗余力地进行销毁。《史记》称“书散亡益多”，《汉书》称“遂以乱亡”，说明礼书在秦火中亡佚了大部分。虽没有全部焚毁，但挟书律等严格的法律制度，也使人们不敢传授。

西汉文献中涉及礼书的资料有以下三处：

(1)《汉书·楚元王传》中有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其中有言：“汉兴，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2)《汉书·艺文志》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多三十九篇，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掇亡等推士礼而致天子之法。”又有：“汉兴，鲁高堂伯传《士礼》十七篇。”

(3)《汉书·礼乐志》云：“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

此外文献中有史料涉及《礼记·缙衣》的，一为贾谊的《新书·等齐》：“为下可类而志也”。这一句在今本《礼记》中为：“为下可述而志也”。而在郭店简本和上博简本中都是“为下可类而志也”。由此可知贾谊所见本与此竹简本合而与礼记本异。此外还有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引《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文字与郭店简本、上博简本略异而大同，传世本在“君以民为体”之后尚有“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二句，简本及《春秋繁露》皆无。

而叔孙通所定的礼仪，不过为适应高祖“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需要，表面上“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其实是“大抵皆袭秦之故”（《史记·礼书》）。他所略定的是秦代的礼仪而不是《五经》的《礼》；而高祖要求“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更明显地表明不是重视西周的礼乐。所以刘歆才说，在汉初朝廷之上的儒者，只有贾谊一人。贾谊作《新书》，其中引到《缙衣》，但因为汉高祖的不重视，古礼即六国礼不会在朝堂之上有什么影响。

《史记·儒林列传》又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以上史料表明汉兴六七十年朝廷经学衰落，而作为西汉官学的今文经学和它的《五经》汉隶书本，就在这段时间，在齐、鲁、燕、赵民间先后形成。《礼记》这个时候也应该从多种版本出现到二戴编辑《礼记》定本的过程，其文字形式上由六国文字变为汉代隶书。作为《小戴礼记》中的一篇，《缙衣》也不例外。

2、礼的传授

因为朝廷的不重视，贾谊、董仲舒都没有传礼的记载，而孔壁、鲁淹、河间三大宗古文经发现后不久就被藏之秘府，学者难见。故据史料，高堂生外别无其他传人可考。对此，而高堂生在秦火前学《礼》，后在汉初写定礼书，他所依据的底本应该被毁了的，否则他也不会仅仅传《仪礼》十七篇；《史记》云“言《礼》自鲁高堂生”，表明他是凭记忆所写的。在吕后、

文帝时高堂生传礼于萧奋，萧奋在景帝中元前后传孟卿，而后苍从孟卿学“礼”是从汉武帝元狩、元鼎年间开始的。后苍在武帝末年写成《后氏曲台记》，立为博士，今文《礼》得立于学官。后苍弟子中知名的有四人，都在武帝后元到宣帝本始这十七、八年从后苍受学的。《汉书·儒林传》云：“孝公（庆普）为东平太傅。（戴）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戴）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闻人）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而《礼记》大题孔疏引郑玄《六艺论》也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9]

由此可知小戴《礼记》所据的汉隶书底本为鲁高堂生所写。而鲁高堂生所据古文经本的字应应为战国晚期鲁文字。

3、戴圣编定今本《礼记》

“大戴之本用后苍编次，也就是高堂生递传下来的原编次第。戴圣与后苍、戴德立异，将十七篇次第重行编排，《汉书·艺文志》所列‘《礼经》十七篇，后氏，戴氏’，就是后氏与小戴不同的意思。”^[10]家法之不同取决于解说经文之义的不同而并不是经本文字之有异。沈先生认为戴德、戴圣所据礼经本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仪礼》都是后苍所传之本，文字并无异同，但解说和编辑就不一定一样。《礼经》重新编排，传《礼经》的《礼记》也会相应调整，因此表明小戴辑《礼记》也就是现在通行的《礼记》本与汉兴高堂生所隶定的本子又有所改定。我们所看到的传世本《缙衣》属于小戴《礼记》，表明其是在戴圣手中最终定本。这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传世本《缙衣》与战国时期郭店简本、上博简本在章节顺序上与后两者完全不同。那么这个版本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或者说戴圣什么时候别立家法的呢？

据沈文倬先生推定，戴圣当生于武帝天汉、太始年间，阳朔二年当在七十以上。其叔戴德治学从政主要在元、成帝之世。叔侄齐名，年龄相差不大，戴圣也应该是成名也应在元、成之时。而他从后苍学《礼》当在昭、宣之间。他在汉宣帝甘露中期以其师后苍师法立为博士，至阳朔二年以后，别起小戴《礼》师法，复为博士。故从此处可以看出，小戴编辑《礼记》，或者说传世本《缙衣》的祖本出现，应该在阳朔二年之后。

关于戴圣的弟子，《汉书·儒林传》中有“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小戴有桥、杨氏之学。”而《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桥君学”。这两处记载放在一块有些矛盾，我怀疑《后汉书》把戴圣记成戴德了，桥仁跟小戴学习，小戴辑《礼记》为四十九篇，桥仁继承其师之学，为这四十九篇而不是为大戴本八十五篇作《礼记》章句，这样才合理。但因找不到确切的证据，姑且存疑。如果桥仁确实为传小戴礼作《礼记章句》的话，那么今本《缙衣》与出土的两个简本《缙衣》在章数、章序上的不同，很可能就是桥仁所改编，而不是戴圣。戴圣只是把四十九篇礼《古记》编成一书而已。

戴圣编定《礼记》把《缙衣》收入之后，从此《缙衣》是否就没有别的文本了呢？未必尽然，当时传礼者除小戴外，还有大戴、庆普、闻人通汉等人。桥仁继承其师之学，为《礼记》作章句；庆普是否有编撰礼书，无法可考，但其后学“又传《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曹褒传》），由此可知戴德、小戴、庆氏三家都以选辑古“记”作解说《礼经》的传授方式。闻人通汉因未被列为博士，其事不具。

虽今本《大戴礼记》中没有《缙衣》篇，并不能就据此推定西汉戴德辑《礼记》时没有把它收进去，也不能因为没有史料记载，就盲目推知这以后没有其他《缙衣》版本的出现。但确定无疑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缙衣》版本陆续亡佚。近两千年来，我们所看到的《缙衣》均为戴圣所编定的版本，一直到上个世纪末，郭店简和上博简《缙衣》的出土，才让我们知道战国甚至更早就有这篇文章的出现，从而得以窥见先秦至西汉时期礼书经籍文本的演变和儒家思想的承传轨迹。

附表:

时 代	版本	著述、传授或重要事件	文字字体	流传情况及章句结构
-494 年至-383 年 （周景王至周威烈王时期）	稿本	孔子：著 子思：记述	战 国 时 期 鲁文字	单篇流传， 章句结构 可依 郭店简本 为标准
-383 年至-320 年 （周显王时期）	郭 店 简 本	陈良：传 抄者不详	战 国 时 期 楚文字	
-221 年之前（战 国晚期）	上博简本	陈良：传 抄者不详	战 国 时 期 楚文字	
-213 年之前（战 国末年至秦始皇 焚书之前）	高堂生隶 定所据本	传者、抄者不详	战 国 时 期 鲁文字	
-194 年至-164 年 （汉惠帝、吕后、 文帝时期）	汉 隶 书 本	高堂生隶定并传萧奋	汉 隶 书	
-149 年至-144 年 前后（汉景帝中 元前后）		萧奋传孟卿		
-122 年至-111 年 左右（元狩、元鼎 年间）		孟卿传后苍		
-92 年至-87 年左 右（汉武帝末年）		后苍被立为“礼”博士 今文《礼》立于学官		
-88 年至-70 年左 右（汉武帝后元 到宣帝本始年 间）		后苍传庆普、戴德、戴圣、 闻人通汉		
-23 年之后（汉成 帝阳朔二年之 后）	今本底本 或叫改定 本	戴德改编汉隶书本《缙 衣》的章句结构并辑《礼 记》；戴德传桥仁、杨荣， 桥仁、杨荣各传其子孙， 其后不显。*	汉 隶 书	

*存疑: 戴德辑《礼记》, 把《缙衣》收入, 未改变其章句; 桥仁为传小戴礼作《礼记章句》, 章数、章序、句读完全改变。

参考文献

- [1]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98.
- [2] 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 [3] 可参看李零: 《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86 页.
- [4]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73 页.

[5]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见沈文倬《荀闇文存》,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9页。

[6] 见《荀闇文存》,第58页。

[7] 陈成国:《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20页。

[8] 姜广辉:《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收录于庞朴等著:《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9] 孔颖达:《礼记注疏·记序》,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64年版,第4页。

[10]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见《荀闇文存》,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56页。

The “Liji • Ziyi” Academic Origins in xianqin to the exactly-dynasty Han

Yan Ruif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as wearing a Santa series of “Ziyi” in the article, a chapter of its era and the subsequent teaching of the situation has long been unknown. Recently excavated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u, like Guodian’s Bamboo and Shanghai Museum’s Bamboo. These two groups of literature have a “Ziyi” papers to prove Was Written no later tha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Passed, Guodian simplified version, the card slips each of the three, so that we can on the “Book of Rites • Ziyi” as some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study.

Keywords: Ziyi; Liji; Guodian’s Bamboo; Shanghai Museum’s Bamboo; the origin

作者简介: 延瑞芳,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历史文献学。

电子邮箱: 303100810@qq.com

通讯地址: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延瑞芳 410082

